

中国共产党 创建史 研究文集



任武雄 主编
百家出版社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JIANSHI YANJIUWENJI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研究文集

任武雄 主编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JIANSHI YANJIU WENJI

百家出版社 出版

封面设计：王 倍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

任武雄 主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上海沪江电脑科技排印公司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 625 字数 581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576-198-1 / D · 14 定价：5.00 元

前　　言

在改革和开放的新时期，我们迎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 70 周年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也就没有艰巨而又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光辉而又艰巨曲折的 70 年的战斗历程，留给我们以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其中硕果累累的领域之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为了纪念党的诞生 70 周年，深入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我们以自己的绵薄的力量汇编了这一本文集，收录近年来关于中共创建史的论著和重要史料 40 多篇。这些文章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活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过及其意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建党思想与

贡献，建党时期的主要刊物与有关活动，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二大对革命纲领的探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等。出版这本文集的目的是在于供广大干部与青年学习研究之用，也是为了便于史学界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十余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研究的论著和资料，不可胜计。而这里仅能收录其中的极小一部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这是需要请读者鉴谅的，并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极为繁重的，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目 录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基础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2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45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	71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成为新思潮主流的	84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史实	97
共产主义小组概述	111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	129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综述	159
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 建立及其活动	178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89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 出席人数的考证	202
关于党的诞生纪念日和党的一大开幕日期	226
论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229
论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251
李大钊对建党的贡献	271
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	282
论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	307
建党时期陈独秀研究述评	329
毛泽东早期建党思想略述	342
董必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349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建党活动	356
建党时期的李汉俊	374
论蒙达尼会议与蔡和森的建党思想	381
杨匏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功绩	391
一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珍贵佚文——张闻天的《社会问题》	397
杨明斋的生平及其最后下落	401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历程及其历史借鉴	408
《共产党》月刊的历史作用	421
《觉悟》副刊对传播马列主义的贡献	442
《星期评论》新论	451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466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	478
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	491
留法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的地位和作用	499
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515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539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	557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几个问题	576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农民运动	581
从“一大”到“二大”——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 革命任务的探索及其影响	585
试论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任务的探索	604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617
关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几个问题	642
马林在华活动纪要	656
中共创建时期的维经斯基	673
参加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	678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基础

田 夫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基础问题，史学界曾有过不少论述。本文试就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党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研究党建立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的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社会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的销售市场。继之，美、法、俄、德、日、意、奥等资本主义列强，也通过侵略战争等方式，接踵而来，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中国的领土主权被践踏，人民被奴役，独立的封建帝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同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比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外国商品和资本的不断侵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促使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日趋衰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和官僚买办企业的出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但它的力量软弱，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6年版，第593页）

在政治统治方面，清朝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后，代之而起的，先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处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之下的近代中国，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都被帝国主义控制。分别依附于各帝国主义的各派封建军阀，各据一方，穷兵黩武，连年混战，使国家长期得不到统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

在阶级关系方面，近代中国社会除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的阶级外，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出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新的对立的阶级。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包括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国资产阶级也相应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同上，第602页），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紧密勾结，残酷地压榨和奴役中国人民。民族资产阶级带有两面性：一方面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缺乏坚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政治上毫无民主和自由权利，经济上极端贫困。

上述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

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同上，第 594 页）中国人民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奋起自救，坚决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和民主革命。

显然，要发动和领导这种革命达到最后胜利，摆在它的领导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能否认清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能否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并指出革命的远大前途？这是中国革命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对中国一切阶级、政党和派别的必然选择：谁能够从理论上、实践上正确地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谁才配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过多次斗争。其中规模比较大、影响比较深的有：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维新运动，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些斗争，充分显示出在中国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不同程度地起了阻止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使中国殖民化的作用。同时，这些斗争也为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打开了道路。

但是，这些斗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历次斗争失败的教训，表明了近代中国社会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原因。

第一，这些阶级和党派都没有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不到三年就在南京建立起同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运动规模之大，席卷了半个中国，坚持时间之长，达十四年之久，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革命初步胜

利后，领导层中的主要成员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坚持和发展革命政策，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旧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相反的，把等级制度、三纲五常、天命论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都保留下来。他们居功自傲，模仿封建统治者在天京（南京）大筑王宫，沉溺于豪华奢侈的宫廷生活之中，而将人民的疾苦、革命的前途置诸脑后。这样，他们就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从而日益失掉了自己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政变，“对于国体主张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八）。这说明他们没有立志于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革命，而只求政体的改良，变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新的革命高潮。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他们对外既没有坚决采取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措施，而是无条件地承认帝国主义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权益，幻想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他们不敢领导人民大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的统治，而是实行同北洋军阀妥协的政策，缺乏坚定的革命精神。

第二，这些阶级和党派都没有提出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具有革命纲领的性质。它的主要内容是，主张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国库”制度，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322页）。这表达了农民革命的理想，也是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否定。但是由于这些主张是在绝对平均主义的指导思想下提出的，它不仅不能解决当时革命战争对粮食迫切需要的实际问题，而且会使农业生产力仍然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能很快向前发展。当时，太平天国政权虽然没收了一些地主豪绅寺庙占有

的土地，也有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夺得了土地，但革命政权并没有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把地主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是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仍然承认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并允许地主收地租。实际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并没有改变。义和团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明确。他们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反映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缺乏正确的认识。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了清朝政府，主张实行三民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实行“土地国有”或“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然而，革命的领导者并不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以为清王朝的统治即满族人的统治，所以，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指的就是“排满”，而不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他们指望推翻清朝政府，但却不懂得也无力量触动其封建的阶级基础，因而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就成了无法实现的空洞口号。他们虽然感到要反对封建必须“唤起民众”，但对广大农民群众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却没有也不能给以满足，因此“平均地权”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说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这个纲领。

第三，这些阶级和党派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太平天国颁布的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它的领袖们“彼此睽隔，猜忌日生”。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地位的变化，他们在革命初期同部下的那种“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亲密关系，以及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作风，逐渐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力、名位的追求。他们各行其是，相互之间的关系起了急剧变化，由不能统一行动发展到领导集团公开分裂。从而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损伤了革命元气，使革命日益走向衰落。辛亥革命是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同盟会领导的。但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涣散的同盟会即宣告解体；代之而起的“鱼龙杂处、真伪不分”的国民党，

从开始成立之日起，内部即分崩离析，接着，其主要领袖人物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又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此后，原同盟会中一些激进的革命分子，虽不甘于失败，接连发动了“二次革命”和护法等运动，但始终提不出一个维系内部团结、引导革命成功的明确纲领和目标。而其他一些成员，有的另组派别，或者游离于革命团体之外；有的则迷恋于议会政治，主张同袁世凯妥协；有的甚至完全脱离群众，铤而走险，从事暗杀恐怖活动。这就说明软弱、涣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一支坚强团结的政治力量。

第四，这些阶级和党派及其领袖人物没有真正认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自耕农和贫苦农民，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主要是指要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对自由平等的向往，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革命领导者不能认识到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推翻封建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资产阶级改良派，害怕和敌视农民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敢真正发动农民斗争。他们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他们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结果便只能向封建势力寻求支持和对帝国主义抱着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近八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尽管各次革命的领导者都曾经提出过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采取过各种的斗争形式，但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不懂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懂得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统治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决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和富强

起来，所以他们都找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他们领导的革命运动，即使是取得过这样那样的一些成就，但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

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国家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封建军阀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极力勾结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主权，造成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阶级来领导继往开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近代中国社会和革命历史发展的总的的趋势表明，领导中国革命这个历史重任的承担者，不可能是别的任何阶级或政治派别，而只能是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

(二)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是以工人阶级的存在和工人运动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基础的。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官办企业和中国私人民族资本企业的兴办和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六七十年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发展到五六十万人。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 1914 年到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法、德、意等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了战争，不可能继续以大量商品输入中国，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夺，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时，日、美帝国主义也乘机在中国增办不少工矿企业。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扩大，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很快壮大起来。到 1919 年，中国产业工人阶级增加到二百万人左右。这是近代中国社会

中一支具有一定数量和政治觉悟的阶级队伍。

中国工人阶级这支新兴的队伍，在数量上同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产业工人的情况（约二百七十多万）差不多。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以这样的阶级队伍为基础，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他们经过近二十年的英勇奋斗，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个历史经验，给中国的先进人物和工人阶级展示了前进的方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方面，具有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它是新生力量的代表者，最有革命性、最有组织纪律性等；另一方面，还有着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独具的突出的优点。

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中外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剥削方式，对工人实行层层的盘剥和压榨。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每天为十二小时至十六小时。很少有休假日。有的官办企业规定：“终年不熄火，不停工，无星期礼拜之说，每月亦无放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1203 页）。工人的工资收入很微薄。一些种类的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够本人的生活，无法养活家属。不少工人，除雇主供饭外，根本没有工资。1921 年周恩来在《旅欧通讯》中曾对比中国和英国煤矿矿工的工资收入说：“相差如是之巨直达四十倍以上”。有些官办企业，采用军事管理办法，强制工人劳动。有的规定工人必须“取具连环保结，填注簿册，方准入厂做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1220 页），有的规定工人“给穿号衣，均住厂内”，“日暮收厂，齐到卡房照册点名，逐一检收，然后各归住处。要路设卡，无论何人出入，必须领签呈验，其无签及有签而不走正途者，一概送局讯办。”（同上，第 1221 页）有的工矿企业设有刑具，工头、监军可以任意体罚、鞭打工人，并可“请地方文武

营泛随时弹压照料”（同上，第1220页）。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和剥削的中国工人阶级，比较容易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他们懂得只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拼死的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压迫和剥削，改变贫困的处境。所以，中国工人阶级迫切要求变革现实的革命，他们在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这是中国工人阶级能成为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程度很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特点之一，是近代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等大城市的少数大的矿山、铁路、纺织、面粉等厂矿企业里，因而工人阶级队伍集中的程度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更为突出。据统计：1894年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城市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七，其中上海一地即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1918年全国的纺织业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在上海。工人阶级队伍的高度集中，不但容易显示出阶级的团结力量和形成强大的战斗声势，而且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科学知识在工人群众中广泛传播，从而迅速提高阶级觉悟和认识本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其中主要的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而中国的农民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伟大历史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这种天然的联系，使工人阶级最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的疾苦和革命要求。工农两个阶级具有共同利益，便于结成亲密的阶级联盟。通过共同的战斗，使工人阶级能不断用先进的革命思想教育农民，实现对农民的阶级领导，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走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此外，从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壮大时期的国际环境来看，世界

政治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对工人阶级的成长也是极为有利的。从 1895 年至 1919 年这一期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出现高涨的新形势。以垄断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为基础的修正主义思潮受到抵制，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国际逐渐走向破产，列宁正为创建第三国际而斗争。这在客观上使中国工人阶级不致受到第二国际的“阶级合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中国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阶段，不具备产生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条件。这些特点，极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团结和行动的统一。

中国工人阶级这些突出的优点，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对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说，除具备一支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工人阶级队伍外，还必须同时注意工人运动发展的进程。也就是说，要具体分析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是否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要求建立自己阶级的组织，用先进思想来指导革命斗争。

中国早期的工人罢工斗争，总的的趋势是：罢工斗争的次数日益增多，罢工的行业和地区范围逐渐扩大，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由分散的、自发性质的斗争，走向有组织的、自觉斗争性质的过程。

据统计：1870 年到 1911 年罢工一百零五次，平均每年二到三次。1912 年至 1919 年 5 月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工人的罢工斗争达一百三十多次，超过了以往七十年罢工斗争的总数，平均每年十六次。而且罢工斗争是逐年增加的。1916 年罢工十七次，1917 年为三十次。

1915 年，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各界人民反